


21世纪的中国： 金融证券与中国经济

主编 史建平 齐建国

 中国市场出版社
China Market Press

本书编委会

- 主 编:** 史建平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
齐建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与预测中心副主任
- 副主编:** 韩复龄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副所长、博士
钱学宁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执行董事
王 聪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傅 民 中共四川省直工委
范秀华 北京城市学院
- 编委会主任:** 王胜春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 编委会副主任:** 李 俊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主任
- 编委会成员:** 梁桂川 北京吉利大学金融证券学院
王纪亮 九江市审计局
邹存艳 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
梅学达 德宏州发展改革委员会
伏国龙 四川大学审计处
张存平 西安市重信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何诚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游水扬 南昌市商业贸易委员会
黄晓梅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周 玮 中国银行稽核委员会
郑建中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周兆平 南京审计学院金融研究所
劳承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马闽华 甘肃省投资促进局
刘景航 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
王增学 中国农业银行芜湖市分行
- 编辑部成员:** 潘先伟 朱海蓉 谢 军 李 政
寇 梦 卢光花 李 虹 李独娇

编者的话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等行业更是得到长足发展。2007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第二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加快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坚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坚持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为“十一五”开好局、起好步。

同时，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一五”时期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正是针对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提出的。转变增长方式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保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则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

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社会快速进步。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多种机遇与挑战。今后我国社会经济形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各行各业尤其是金融、证券、保险、房地产等行业究竟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应制定什么样的策略去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求得发展？已成为各级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和广大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为了及时总结我国经济建设与各相关行业运行的经验与教训，及时将最新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加强学者之间的交流，中央财经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编辑出版《21世纪的中国：金融证券与中国经济》一书，为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提供参考与指导。

该书是定期出版的一部大型学术文献，由我国著名的经济金融专家、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史建平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齐建国先生担任主编。该书大约100万字，16开豪华精装版，收录200多篇具有较高学术研究价值和较强行业指导性的文章。该书刊登论文范围大体分为宏观经济、金融证券与保险、战略管理三个部分。为了便于查阅，按照研究领域的不同，

我们把全书共分为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篇、宏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篇、区域经济篇、行业经济篇、国际贸易篇、金融证券与保险篇、战略管理篇、经济理论教育篇共8个篇章。

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交流与学习，给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与领导提供参考与指导是我们编辑出版该书的初衷。由于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望大家不吝赐教。同时，希望广大读者朋友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改进与逐步完善，力争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以回馈读者。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值此出版之际，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2007年6月

目 录

经济理论与思想史篇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宋 伦 李 刚(1)
创新经济学的六大切入点	何 明(5)
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刘海燕(8)

宏观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篇

影响国家审计工作的因素浅析	葛瑞兰(12)
促进农民增收所采取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	王 莉(14)
我国会计制度选择及国际化问题研究	苏 强(17)
信贷资源配置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宋汉光(19)
经济发展与日本金融制度的演变	刘 红(23)
警惕国外跨国公司给我国造成的税收黑洞	李婉莹(29)
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管理	郭 军(32)
WTO 环境下经济主体的文化需求与对策	陈遂彦(35)
财务报表分析若干问题探究	杜文昌(37)
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重在发挥监督职能	何尊荣(39)
国有煤炭企业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治理研究	马伊安(41)
广西改革和完善财政投融资体制的基本对策	潘 稔(45)
论我国市场化改革中公共财政运行机制的构建	潘文轩(49)
金融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调查与分析	祁宝元(53)
资产评估质量与风险控制研究	史晓华(56)
转变观念 融入市场	
——对国企派驻财务总监引发的思考	章光新(59)
建设服务型央行的认识与思考	李应清(62)
必须重视应收账款管理	邹存艳(64)
一个棘手的问题:内部控制	
——从中航油事件看我国的内部控制	斯秀娥(66)

对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的思考	郑树健(70)
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高闽丽 夏学洪(73)
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成因探析	齐宇冲(76)
积极开展经济效益审计 加强固定资产审计监督	曲玲 陈磊(81)
从审计风险透析我国审计模式的发展趋势	魏茹(84)
中小企业财务战略思考	徐勤(86)

区域经济篇

创新县市区域融合经济发展的思路	王克念 邓小兵(89)
发挥财政功能导向 促进闽北企业发展	谢利龙(92)
把梅河口建设成为新型轻工业城的战略构想与分析	宫波 于建立(94)
在西部大开发中对德宏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考	梅学达(96)
浅议绿色会计与珠三角地区产业转型	刘雪梅(98)
打好三张牌 建设中心区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发展县域经济初探	蔡国庆(101)
侯马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与思考	赵敏(104)
金融支持柴达木经济之浅见	罗宁(106)
浅谈乌昌经济一体化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董生亮(107)

行业经济篇

4S 店要因地制宜	陈华云 尤克诗 徐根松(113)
投资项目经济评价中土地使用权有关问题的讨论	赵虎林(115)
西安市房地产市场形势分析及对策	张存平 李拓(118)
城市市政工程量控制与造价控制的探讨	吴永红(122)
对温州市非公有制粮食经济管理和发展的思考	李光辉(128)
论建设工程设计阶段投资控制	伏国龙(131)
打造核心竞争力是烟草企业自主创新的目标	王健强(133)
上海港口物流发展战略刍议	李上康(135)
浅谈施工企业经济效益审计的重点和方法	王斌(138)
从贵州茶叶在全国的地位、国内外市场谈贵州茶业的产业化	管家骥(142)
论市场营销的道德建设	姬波(145)
论体验式营销的运作和应用	高英(148)
构筑现代化的商品物流体系 为东莞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服务	韩任海(150)
规范建筑招投标市场的几点建议	何培坤(153)

加强异地进口货物流向管理对策探讨	翁晋熙(154)
构建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金融支持体系对策分析 ——以长春为例	祝滨滨(156)

国际贸易篇

比较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与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	季剑军(160)
电子商务环境下进出口贸易的供应链管理	孙建军(163)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实证研究 ——基于制造业的实例	徐 勇(166)
用科学发展观发展湖北的国际加工贸易	张良宏 张良顺(173)
战略联盟应是外贸服装企业的理想模式	宗晓健(183)
出口退税政策分析和建议	王志明 郭慧宁(187)
多哈谈判的影响及我国农业贸易前景	朱启松(190)
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企业的影响	李媛媛(193)
提升中俄经贸关系需要媒体助阵	张举玺(197)
《TRIMs 协议》中的国内税问题研究	龙英锋(201)

金融证券与保险篇

改革与完善军人保险制度的思考	陈 冲 吴富琼 张 垒 妙 晔(205)
深化军人保险管理研究之我见	陈 冲 吴富琼(209)
国库单一账户内控建设的几个问题和建议	陈穗康(212)
推行意外伤害保险 促进行业安全管理 ——建立和完善建筑意外保险运行机制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成国华 顾勇军(214)
基于银行贷款安全目的的抵押资产评估理论与方法创新:一个初步框架	崔 宏 程凤朝(218)
惠州市跨国三资企业融资需求调查及商业银行营销对策	范 颢(224)
我国券商的现状与发展问题研究	冯裕健(227)
制约农户小额信贷发放工作的因素与对策	郭东福(232)
大学生收入期望模型及对助学贷款的意义	洪银萍(234)
人寿保险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罗艾宇(239)
中国大陆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研究	秦立莉 亓玉华(244)
引导保险消费行为提升广西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余伯明(249)
农业地区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支持之梗阻及对策	生 凡 唱润田(252)
完善反洗钱工作的对策	宛 利(254)

浅析汽车消费借款中保证保险的法律问题	王华敏	张凯水(256)
浅谈数据挖掘在证券行业中的应用	王 剑	(259)
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经营	魏 宁	(263)
金融混业经营与金融协调监管	张小军	(265)
忻州市信贷资金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个案分析	张晓琦	(266)
浅析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周 明	周述忠(270)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反假货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思茅市江城县为案例		朱 霜(273)
西双版纳边境地区反假货币工作的现状、难点及对策	朱云贵	(275)
证券监管中行政诉讼风险防范的法律思考	陈 宇	(277)
如何提高银行监管效率:监管当局风险监管与银行风险管理互动关系的视角		范秀华(284)
民间金融组织战略联盟的新动态与理论思考	刘玉平	(287)
由农民工退保谈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谭樱芳	(290)
新形势下中国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及其创新	赵利梅	(294)
“双过剩”下国有银行的困境及出路	董玉华	蒋剑平(296)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金融战略选择	胡建民 高 立	王德波(299)
当前我国消费信贷创新监管问题探索	邱玉祥	(305)
农业银行改革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王继伟	(308)
员工持股计划理论解析及运行机理研究 ——对西方投资银行和我国证券公司的比较分析	何诚颖	陈东胜(311)
我国金融部门 FDI 快速增长的原因及影响分析	郝 琪	(318)
中外银行竞争力中的金融服务工具创新对比 ——网络银行的改进与完善		姚力楠(322)

战略管理篇

现代企业的经营战略与决策	胡亦斌	(329)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几点思考	李洪斌	(332)
加强企业内部会计监督 促进企业内部管理上水平	秦良玉	(336)
军校为西部经济发展培养人才可行性研究	王柱京 李连启	李 云(337)
外贸企业内部控制的改进对策	郑 宏	(339)
要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应收款的管理	周文军	(342)
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的思考	林照兴	(343)
浅析人力资源绩效考核	李 琛	(348)
现代并购——轻资产并购	梁桂川	(351)
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对策研究	马秀石	(353)

对加强应收账款管理措施的探讨	喻小霞(355)
县级财政部门加强会计管理的措施	彭章贵 郭重新 向辉(358)
论知识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李火光(359)
证券投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探寻	博斌 曾伟(362)
中越边贸结算的征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农飞龙(365)
基层央行网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余海 杨耀武(366)
推行企业经营者年薪制的几点思考	凌建华(369)
对内部审计进行内部控制审核的探析	孙福旗(371)
谈创业企业的财务体系建设	徐中祥(381)
对提高内部经济责任审计质量的看法	杨维玲(382)
浅议施工企业工程成本的管理与控制	郑华(384)
浅谈内部控制	吕斌(389)

经济理论教育篇

谈《店铺开发规划》课程的教学思路	方名山 曹静(392)
现代金融学教育与人才需求	邵福利(394)
浅谈怎样编写财务分析	何少兰(396)

经济理论与思想史篇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 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宋 伦
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李 刚

摘要: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为了联乡谊、促发展,联手在青海各地设立会馆,并以此为根据地将他们商贸活动的触角深入到青藏高原的深处,为沟通青海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作出了贡献。并且,在16世纪中国出现“现代化因素”条件下,山陕会馆的活动有力促进了青海市场经济因子的生长,会馆的性质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研究这一变化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明清时期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而且对今日西部大开发可提供历史借鉴。

一、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活动概况

青海西宁作为西北商贸的“金城五路”之一,在明代初期就有山陕商人活动的足迹,这与山陕商人抓住明政府实行“茶马交易”政策的历史机遇,开拓创业有直接联系。

明代初年,为了防范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鞑

制边外土蕃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明政府以茶叶为武器,在西北边地实行“茶马交易”政策,即将陕西紫阳、汉中茶区的茶产仿效“食盐开中”的方式由商人运到秦州、西宁,交换边外少数民族的马匹,使“戎人得茶,不得为害,中国得马,是为我利”(《明史·卷八十·食货·茶法》),这就是明代以来长期存在的西北边茶贸易。由于西北边茶最早实行于陕西,使得山陕商人抓住这一政策提供的市场机遇,不畏艰险,远上青藏高原,将陕西茶产丰裕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陕西商帮迅速崛起。特别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后,山陕商人就开始在西宁开展贸易活动。《秦疆治略》中载,来西宁交易的“自汉、土、回人而外藏民甚多”,使西宁市场“牝牡骊黄,伏枥常以万计……负提擎载,交错于道路”,其中“晋益志”、“合盛裕”是西宁最早由山陕商人创办的商号。

寻常之物,一经商人“波斯”之眼便价增10倍。山陕商人将内地茶叶、布匹运至甘宁,回程又看准青海皮毛资源的市场商机,顺势开发了青海的西口皮货贸易,大量收购了西宁的羊皮、牛皮,贩回陕西的泾

阳、大荔，硝制成裘皮畅销内地。最初在西宁做皮张生意的主要是陕西同州（今渭南）和山西大同等地的商人，加之陕西商人又在西宁开发布匹、药材生意，“于西宁等地采挖收购，自制成药销售”，使明代西宁“做生意的人，山西省的人为最多，其次是陕西省的人”，（《清末民初 1912 年建省前的西宁商业情况》，青海省图书馆编，油印本），他们基本上操纵了西宁的商贸活动。

入清后，为了缓和西域草原的民族矛盾，加强边疆建设，清雍正二年（1724 年），准许准噶尔藏蒙人民入藏“熬茶”，途经的丹噶尔城贸易开始兴盛起来。“蕃货云集内地，各省名商辐辏，每年进口货价至百二十万之多”（《丹噶尔厅志》卷四一五）。丹噶尔在雍正以后二百年间成为青海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有小北京”之称。大批山陕商人赴湟源做皮毛、布匹、药材生意，在湟源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就有 230 多人，至今湟源的多数居民都是明清以来秦晋商人的后裔^[1]。在西宁和湟源的陕西帮商人“大者十一家，聚义成、秦源涌、兴原合……批发京广杂货兼办皮毛或药材和经营颜料纸张或布匹海菜等”^[2]。他们生意做得都很大，仅布匹“从三原采办，每年的销售量即一千卷，价银二万五千两，十分之八在丹地售给当地商人，余下在蒙藏销售”^[3]。每年经丹运销陕西的羊羔皮十万至十五万张，价银八万两，野牲皮四五千张，价值五千万两（《丹噶尔厅志》卷四一五）。这些山陕商号多采取“联号”经营方式，将贸易触角深入到草原深处，如山陕商人兴办的“协和商栈”，总号设在西宁，分号包括湟源兴海商栈、贵德生成商栈、同仁兴隆商栈、循化统盛商栈、共和经海商栈、同德协永商栈、上五庄济成商栈、鲁沙尔集成商栈、藏寺益成商栈和乐都、民和、叠源、大通、互助、化隆、海东、八宝、贵德分号（《青海协和商栈组织规程及经营皮毛药材暂行办法》，青海图书馆藏铅印本）。这种蛛网式经营方式，带动了西宁、湟源周边地区湟中、贵德、门源、上五庄、隆务寺等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之成为土特产集散中心，形成以湟源为中心的新的市场网络结构。当时湟源作为海藏通衢的贸易总汇，已形成东大街、西大街、中大街、仓门街、隍庙街等商业中心市场和东关半里街的牛马骡及西至前街羊毛贸易的专业市场，“每年集散的羊毛总额约四千万斤以上，各类皮张，亦不下三十余万张……每逢元宵节，商店用彩布篷街，爆竹通宵，可谓盛一时之极”^[4]。

西宁、湟源贸易的繁盛又拉动了青海南部藏区商贸经济的发展。青海的山陕商人和藏商“赶着骡马、

携上银元赴西藏及印度经商，横穿藏民区而过的时候，总在西宁或湟源筹措了一切应用之物，于旧历六月初动身，七八两个月穿过藏区……因此青海与西藏通商一年只一二次”（《雍言》第 2 卷第 9 期第 39 页）。而在青藏商路上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还是山陕商人。玉树的商号“多系陕甘川藏等处行商”，“陕商六家以世昌隆为较大”，连商会会长都是陕西三原人，且“至此已二十余年，娶藏妇，生二子一女”，他们是玉树商业的主要操纵者，“自各地携物来售，售罄后将玉树土产拉往内地……玉树贸易全赖此辈流动商人为之往返”^[2]。结石商业“以陕甘为多……民初有山陕商三十余家”^[2]。

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是从自己的老家三原、泾阳、渭南赴陇右和西宁做生意的，他们在西宁、湟源开的商号许多就是三原、泾阳总号的分庄或分店，当时叫做“驻中间，销两头”。这便使得青海经济走出“悬浮域外”的闭塞状态。通过他们的活动使之与内地经济发生密切联系，青海成为西北地区以陕西三原、泾阳为中心市场，以天水、兰州、肃州、宁夏、西宁西北五路为中级市场，以湟源、湟中、贵德、民和等县城市集为初级市场的区域市场网络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就是西北地区山陕商帮长期存在的“标期汇划”流通体制。“每月二十一日为标期，行店和商号均收讫外欠货款，统一结算；二十三日为走标日期，就是送货款，这几家商号把走标的银两均装成木匣，由经常驮送标银的脚夫驮送兰州的庄口，送标银时还请西宁镇派骑兵七八名护送兰州。兰州庄口每月二十九日分送陕西三原、泾阳、韩城、凤翔等庄口”（《西宁建省前的商业情况》）。每年从甘宁流向三原、泾阳的标期银两就不下二千万至三千万两^[5]。

进入清末后，青海的商贸形式有所变化。一是在山陕商人的引导下，陇青人民商帮初开。他们开始自办商号、自办歇家，分取山陕商帮利润的一杯之羹。二是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三是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究，“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贷货，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6]。这些造成陕帮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

帮”^[2]。不仅西宁如此,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民国十九年结石陕甘公所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13家,陕西9家,四川5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2]。这些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有力佐证。

二、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明清山陕商人抛妻别子远离家乡赴青海做生意,他们流寓客地人地生疏,作为“客商”,被客客气气地定格在当地主体文化的边缘,在青海还有藏汉语言不通的又一层困难,更增添了“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愁绪。为了化解乡愁,联络感情,集合力量与本地商帮和其他客帮竞争,山陕商人在青海各地捐资修建了以省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作为商帮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会馆,成为促进他们商贸事业发展的根据地和保障所。

山陕商人在青海设立最早的工商会馆是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由山陕商人在西宁捐资修建的“山陕会馆”。由于祭祀关公,所以亦叫“关帝庙”。会馆在西宁购置地产两处,一处在西宁府东关路南的南庄子早台上,叫“山陕台墓地”,用来暂厝埋葬亡故的山陕同乡;另一处在西宁东部曹家寨附近,占地数十亩,称作“山陕义地”,也叫“香粮地”。该会馆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海东回民抗清斗争中被焚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重建^[7]。“会馆内16家商号的经理为会首,他们分为内外两帮,入会馆者为内帮,不入会馆者为外帮。但入会馆为内帮的商号每家要交本银二十四两”^[8]作为会馆的经费。山陕商人除在西宁设总馆外,“后来陆续建有湟源、大通、民和等分馆”^[9]。湟源的山陕会馆在隍庙街的“玉皇庙”^[10];民和县上川口镇的“山陕会馆”在川口东街,“会馆面积约五亩,靠北大殿三间,雕梁画栋,门窗檐壁彩色油画,极尽精致,形如古庙宇。大殿供财神爷、关云长、马王爷三个牌位。大殿两边皆有耳房,作为伙房、库房。院内东房一面正南戏楼三间,两边铺面,戏楼下面走道,上面戏台”^[8]。山陕商人不仅在青海人烟稠密的汉藏边地设有会馆,就是在青藏草原深处亦设有会馆。如结石就有“陕甘公所”(明清之际,公所、会馆通称,会馆小而为公所,公所大而为会馆),“系商界所建。犹各地之关帝庙。惟此地因市面甚小,仅此一庙,各神祀于一室,除关帝外尚有孔子、财神、马王等,可谓文武一堂,圣神合一,故曰奉祀公所”^[2]。可见,捐修会馆是那一时期山陕商人普遍的现象。

另外,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西宁、湟源等地开设

的“私人歌家”,最初亦有会馆的性质。因为,歌家的“歌”字,即汉语“歇伙”、“歇脚”之意,歌家最初的语言符号即是指汉商贸易歇脚中转之地。因此“最早的歌家,本系山陕籍商人”^[10],它是山陕商人为方便贸易而设立的多功能综合性贸易组织。那时山陕商人在青海主要从事茶叶、皮货、布匹的大宗贸易,这些原料商品货重量大,布动辄千匹,革动辄千张,携财笨重的商人赴边地贸易自然需要有一个堆放货物和解决食宿的所在,他们“为了争夺市场扩大贸易,于是各尽所能,占用广阔的地皮大兴土木,修成一座很大的院落和能容二百头牦牛的畜圈……歌家们及时修建自己的住宅,在大院内,设有大厨房,安置大锅三口,以备熬茶,炸馍,煮牛、羊肉之用”^[11]。因此,最初山陕商人创立的“歌家”,既是堆放货物之地,又是解决食宿之所,还是居间贸易的商业中介组织。这同他们在内地设立会馆作为“居停货物之所”、“使士商行旅无道路之湿”的功能并无二致。所以,山陕商人在青海从事商贸活动初期的“自办歌家”或“客办歌家”,无疑具有会馆的雏形,它同山陕商人共同构筑的山陕会馆存在着省籍乡缘上的归属联系。当时在西宁、湟源,山陕商人自办的歌家就有38处之多^[10]。只是后来,由于经营歌家利厚,许多本地商人因具有地缘优势而插手歌家业务,走上“主办歌家”的道路,山陕商人遂放弃歌家业务,转化为本地歌家服务的对象。这说明山陕商人作为青海歌家的始作俑者,把自身的商贸活动与青海地区民族贸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设立了“歌家”这一明清会馆史上的新形式,成为青海歌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先驱。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各地设立的会馆,对保证山陕商帮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都起了积极作用。

首先,会馆保障了山陕商人在青海商贸活动的顺利开展。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本身是商人们联乡谊、议商情、保商事的准官方民间自治团体。明清时期从陕西到西宁步程30余天,山陕商人们骑马赶骡、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到达青海,又遇流寓客地、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的人生境遇;加之,羁糜逆旅、成败难料和面临本帮、他帮客商的激烈竞争,自然需要有一个保障财产、联络感情、沟通信息、发展业务和化解乡愁的组织,为商人们排忧解难。青海的山陕会馆正是适应了这种市场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同乡组织,帮助山陕商人解决在西宁、湟源的货物存放、食宿住行、出具他们往来各地的身份证明以及死后安葬问题,免去了商人们在青海客地活动的后顾之忧,使

商人们在客地获得一种有组织力量的支持和心理归属的安全感。会馆定期举办活动,“每年开会四次”,一般时间为“农历五月十三、六月二十二、七月十三、九月十三日”^[8],为青海的山陕商人们提供了联络乡谊、化解乡愁的机会;同时,通过这种同乡商人的联谊活动,又整合了山陕商人在西宁、湟源等地的力量,将个体凝聚于群体之中,既提升了山陕商人的团体意识,又增强了山陕商帮在青海的整体竞争实力。会馆祭祀关公,既为山陕商人抵御市场风险提供精神依托,又为规范山陕商人市场行为提供道德约束。山西是关云长的老家,陕西是关云长的改姓之地,因此,山陕两帮商人莫不崇祭关公,各地的山陕会馆一般都称为“关帝庙”;而关公忠义果敢、挂印封金的忠贞品格,正是山陕商人携手共赴竞争的精神纽带,它为山陕商人坦然面对商场风险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商人们以关公重义轻财的人格为准则,又树立了诚信不欺、公平交易的行为规范,以“人神共愤”、“头上三尺有神灵”作为克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道德约束,保证了市场交换的正常秩序。

其次,会馆促进了青海市场化因素的正常发育。按照吴承明先生的观点,中国自16世纪就出现了“现代化因素”,也即“市场经济的萌芽”,并把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的出现视为“现代化因素的征兆”。^[12]从这一理论框架出发探讨青海山陕会馆的功能,其推动青海市场经济萌芽发育的作用十分明显。一是山陕会馆已冲破此前仅仅作为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行会组织,开始向谋利求财的市场组织转化。明中叶后的山陕会馆已不是单纯的敬神麻、联乡谊的祀福之地,而是日益朝着议商事、通商情、保商利的经济组织转变。川口山陕会馆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沟通信息,发展业务,有事公议”,而且,庙会期间“除祭奠财神,还商讨事务”^[8]。进入民国后,津帮、洋行商人与山陕帮在羊毛生意上竞争激烈,山陕商的大德隆商号以会馆为靠山,运动当时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骥,竟坐上他的官轿,带领宁海军队,在湟源收购羊毛以抗衡,后来山陕会馆还代表山陕帮利益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会馆捍卫同籍商人共同利益抵制洋行侵略行径的爱国举动显而易见。^[4]二是会馆冲破行帮的封建束缚开始向市场主体转变。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已不单纯是行帮的办事机构,而开始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会馆的经费除过会时由山陕商号捐资布施外,主要靠人会内帮商号所交的会费本银维持,并且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本号营业,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青海建省前

的商业情况》)。而这些“馆底存息”则以会馆的名义应商号要求作为投资生息取利,“事后由会头公布账项”,这表明会馆开始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资本营运。川口山陕会馆戏楼两边设有铺面以供庙会期间商人经商使用,其市场化因素也很明显。^[8]三是会馆实行开门办馆反映了会馆克服“非本帮莫人”的封闭性,闪烁着与时俱进的商业精神。辛亥革命后,由于山陕商人在西宁的力量强盛,本地和外地商人相继依附于山陕商帮,20世纪30年代不少外籍和本籍商人也参加山陕会馆的聚会,40年代更有河南、山东、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商贩和手工业者依附于山陕商帮,参加会馆的聚会和布施活动,甚至山陕会馆的墓地也向外籍商人开放使用。^[7]这些真切记录了会馆突破地缘乡土关系的封建行会性质,开始朝着业缘商人共济团体的现代商会组织转变的历史轨迹。这种转变使会馆从“阴会馆”、“死人会馆”转变为“活会馆”、“向阳会馆”,表现了会馆顺时趋势的开放意识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最后,会馆张扬本土文化并促进了内地优秀文化在青海的传播。明清时期的青海作为边关极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山陕商人赴青海贸易既为青海汉藏人民带去了先进的经营思想,开辟了本地人民经商谋利的社会风气,也为他们带去了内地优秀的传统文化。因为会馆作为流寓客乡商人的同乡组织,其建筑风格本身就是山陕本土文化在客地的物象反映。商人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极力陈铺和张扬本土文化以寻求精神家园和情感归宿。所以,青海的山陕会馆莫不建筑恢宏,一般均由山门、戏楼、拜殿、春秋楼组成,是关中四合院在青海的复制和粘贴,这便使得会馆成为当地居民娱乐的好去处。“川口没有公共娱乐场所,所以每逢年节演戏……展览会,社会都用此处(山陕会馆)的戏台”^[8],使之成为川口唯一的社区文化中心。而会馆的庙会 and 招待客户的行会戏,又促进了秦腔在青海的流播。山陕会馆于每年六月二十二关公诞辰日都要唱三天或五天大戏,叫“行会戏”,陕西的许多著名秦腔戏班和名角都是在山陕会馆唱红的。行会戏一般唱两天,第一天是“踩台戏”,第二天是正戏;先演三折,叫“献戏”,是演给神佛看的,故庙会唱戏也叫“娱神”,然后才是唱给商人们观看的。演戏中间,会馆要端上一盘桃蒸馍及一大块鱼肉,以供演员们午餐,^[13]体现了人神共乐的人情味和东方商人特有的机智与幽默。

参考文献:

- [1] 焦文彬. 古都长安、长安戏曲[M]. 西安: 西安

人民出版社,2000.

[2]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3]王致中,魏丽英.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

[4]廖蔼庭.解放前西宁一带商业和金融业概况[G].青海文史资料选辑(一).

[5]刘迈.西安围城诗解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6]赖存理.回族商业史[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

[7]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及历史作用[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3).

[8]马德章.川口山陕会馆[G].青海文史资料选辑(十二).

[9]王煜.青海简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

[10]闫成善.湟源的歌家、洋行、山陕商人与刁郎子[G].湟源文史资料选辑(五).

[11]蒲涵文.湟源的歌家和刁郎子[G].青海文史资料选辑(八).

[1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3]陈邦青.解放前西宁戏剧概况[G].西宁文史资料选辑(四).

创新经济学的六大切入点

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党校 何明

摘要:

经济学创新的实质在于使其理论更加科学化,这种创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内容的有机结合。从科学的完整性、方法、公理性立足点和价值理论、供求理论及生产关系本质等六大切入点出发,我们有可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运用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以超然其上、包容改造、去伪存真和敢弃敢扬的气度看待其他经济学理论,并据此使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化。

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钻研,我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商品论》、《微观经济运行论》、《宏观经济运行论》和《社会形态演进论》四本专著。有学者认为这些专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创新性。简括之,这种创新有六大切入点。

一、如何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科学化

在经济学领域,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老师都宣称其所讲授的是科学理论。这实际上暗含着这两种经济学能否有机结合的问题。换言之,如何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科学化。

在自然科学领域,关于科学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指基础理论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二是指实用技术意义上的科学理论。由此产生了科学和技术的

区别。一般地,“科学回答的是‘是什么’、‘为什么’,技术回答的是‘做什么’、‘怎么做’;科学提供物化的可能,技术提供物化的现实;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技术是综合利用知识于需要的研究。”^①可见,科学探索的是事物的本质和客观规律,其所获得的原理性认识是具有一元性的科学知识;它具有指导性。而技术则泛指在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其所获得的实用知识是具有多元性的技术知识,它具有实用性。将本质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和实用意义上的技术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便形成完整意义的科学理论。

对经济学理论也可作如是观。即经济学理论要成为完整意义的科学理论,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经济活动本质关系和客观规律的探索,其所得出的认识构成基础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通常具有一元性,其突出的作用在于它是实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二是对经济活动现象关系的表面分析和概括,其所得出的认识构成了应用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通常是多元性的,其突出的作用在于它具有实用性。

我的研究表明:作为经济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具有一元性的科学理论;但在实用经济学理论

方面,却论述得不够全面和深入;而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却有着较为深入的分析,其实用经济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由此,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便有了可能。这是创新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其意义在于: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内容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科学化提供了基点。

二、如何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

理论的科学与否与研究方法有极大的关系。在经济学研究中,如何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是创新经济学的又一个切入点。

爱因斯坦曾指出,伽利略的发现及他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伽利略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其著名的斜面实验告诉人们,他所使用的就是理想实验法,即撇开影响事物的现象因素,从而在理想状态下研究事物的本质。在我看来,这一方法实质上就是科学抽象法,运用这种方法得出来的正确认识就是对事物本质的揭示。物理学知识还告诉我们,在已经掌握事物本质的基础上,再恢复被撇开的现象因素,探讨这些因素对事物本质的影响,分析事物本质在这些因素作用下的实现程度和具体表现,从而尽可能地把把握事物的整体状态和运动全貌。我将后一种方法概括为整体抽象法,运用这种方法得出来的正确认识就是具有实用性的技术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论的建立,首先需要运用科学抽象法(或理想实验法),据此可以得出关于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的认识,从而建立科学的基础理论。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整体抽象法,据此可以得出关于事物现象和表面联系的认识,从而建立科学的实用理论。我把上述两种方法合称为两步抽象法。

要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科学化,也必须运用两步抽象法。我的研究表明:第一,马克思著名的“由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再由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两步抽象法。所以,马克思的这一著名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是一致的。第二,要建立完整意义的科学理论,必须运用两步抽象法。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舍弃作为第一步的科学抽象法而直接运用整体抽象法,那么,这种方法就是所谓的实证分析法。所以,实证分析法具有实用方面的科学性,据此能够得出在经验技术上具有实用性的技术理论。但运用实证分析法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不可能得出本质意义上的科学理论。换言之,两步抽象法中的整体抽象法,是

对实证分析法的扬弃,它改造并包容了实证分析法。

将两步抽象法运用于对经济学理论的创新,第一,要求我们首先运用科学抽象法,即舍弃各种外在因素,透过经济现象找到其本质和客观规律。第二,在掌握了本质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再运用整体抽象法恢复那些被舍弃的外在因素,把握事物的整体面貌,并由此掌握经济本质或经济规律的具体实现形式或实现程度,而这一认识本身将构成应用经济理论的内容。

三、如何确定经济学理论的公理性立足点

在自然科学领域,公理性知识往往是一门学科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或立足点。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推理严密、准确、透彻、清晰,人们折服于其结构的宏伟、思维的缜密。但是,奠定它的基础却只是几条简单的公理。爱因斯坦曾说,一个思想体系,“一般是在逻辑上从少数几个所谓公理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来的。”他所创立的相对论,就是以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为安身立命之基础。可以说公理化思想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成果。所谓公理,指的是“在一个系统中已为反复的实践证明所证实而被认为不需证明的真理。可作为证明中的证据”^②。这就是说,凡是能够作为公理的观点,是那种在实际中找不到任何相反例证的观点。公理学的实质在于:因为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命题,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故而以此进行的符合逻辑规则的推理所得出的命题或定理也为真。一定意义上,人类文明赖以建立起来的基础正是公理学。公理是各门科学的基础理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石。换言之,一门学科的立足点如果具有公理学意义,便意味着这门学科有了坚固的科学基石。

在经济学领域,价值理论是最为基础的理论,我们能否找到这一理论的公理性基石呢?劳动价值论作为科学的价值理论,其重要的基础是劳动二重性学说,这固然不错。但我的研究表明,尽管如此,劳动二重性学说并不是确定劳动价值论的公理性基石,这个基石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简言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这个立足点,才是劳动价值论从而是经济学理论的公理性基石。唯物史观的公理性观点是:任何人都必须首先解决吃、穿、住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其他社会活动。这一观点用中国古人的话说就是“民以食为天”。应该说,这是十分简单的事实,谁都找不出一个相反的事例来推翻它,从而是公理性认识。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才能进行如下的逻辑推论:要解决吃、穿、住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人类首先必须进行物质

资料生产,即从事生产劳动,在此基础上才有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可见,将唯物史观的立足点上升为公理学知识,并将其作为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意味着经济学的更加科学化有了一个牢固的、无可挑剔的逻辑起点。

四、什么是科学的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论最为激烈的基础理论。什么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人们并没有一致的认识。

科学发展史上也有这种情形。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遭到教会势力的严厉打击,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因为它触犯了后者的利益。而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日心说比地心说更为科学,并不是因为它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因为它与前者相比,是更符合客观事实的认识,是更为客观的真理。

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同样如此。在经济活动中,价格是非常明显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内在本质是什么?这种好奇和发问是催生科学思想的萌芽。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对价格的本质进行过思考,他虽然没有找到价格的本质,却对商品交换等式成立的标准有着极为天才的判断。他认为,不同的商品能够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在于这些商品中存在着质上相同、量上可以比较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就是商品的价值,就是价格的本质。事实上,这之后的经济学家在探讨价格的本质时,都或明或暗地以这一认识为基础或前提,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判断符合最简单的哲学逻辑和数学逻辑。

在物理学中,凡是具有重量属性的物体,均可以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一定有相应的计量单位。比如,10公斤(铁)=10公斤(花生),在这一数学等式中,质上相同的东西就是铁和花生都具有的重量属性,这种共同的东西是比较得以进行的质的基础;而进行比较的量的基础即计量单位是公斤。商品交换的外在等式相当复杂且丰富多彩,比如可以是10公斤(铁)=50(元)、也可以是85公斤(花生)=50(元);简单的数学逻辑告诉我们,上述两个交换等式实际上意味着10公斤(铁)=85公斤(花生)。同样非常简单的数学逻辑告诉我们,这一交换等式在数学思维中是不成立的、是荒唐的。但我们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这种荒唐的交换等式在商品经济的现实中却广泛存在。于是,简单的哲学逻辑和数学逻辑同时启示人类,在这种具有荒唐性的等式背后,一定存在着本质上不荒唐的数学等式;这种等式将足以说明,在所有商品交换的公式中,存在着质上相同、量上可以比较的共同的东西。如果说价格的本质是价值,那么,

从科学角度判定,价值的标准便有两个:其一,价值必须是所有商品都具有的某种属性,这种属性就是质上相同的东西。其二,价值还必须具有进行比较的量的基础,即有与质的属性相适应的计量单位。简言之,在商品的众多属性中,只有同时符合这两条标准的属性才体现了价格的本质,才是价值概念的科学内容。

一旦把握了判定价值概念的两条标准,就容易看出,唯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是科学的价值理论;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合乎规律的逻辑推理。而我的研究还表明,同时符合判定价值两条标准的概念一旦建立,它还是价值理论实现数学化的逻辑起点。

五、什么是供求的本质

供求关系也是商品经济的普遍现象,那么,供求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供求一致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只有对事物本质充满好奇、同时力图揭示这种本质的科学家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西方经济学家中似乎没有人这样提出问题。而提出上述问题的恰恰是马克思。在谈到供求时,马克思指出有两个“真正的困难”:一是给供给和需求下一般的定义是“真正的困难”;二是要弄清供求一致究竟指什么,是“真正的困难。”在这里,马克思实质上提出了探讨供求本质的课题。由于各种原因,马克思未来得及解决这些困难。因此,弄清供求的本质,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任务,也是使经济学理论更加科学化任务中必须解决的另外一个基础理论问题。

一旦用科学抽象法对供求的本质进行探讨,就会发现影响供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价格、资源、政治、历史、文化甚至自然因素等等都影响着供求关系。只有撇开这些因素才能较好地探讨供求的本质。我的探讨表明,一旦撇开这些因素,那么与供给紧密相连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或客观效用,而与需求紧密相连的是人们对使用价值或客观效用的主观评价,即主观效用。由此形成了与劳动价值论相对应的效用矛盾论。而通过对效用矛盾论的探讨,我们发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必将在社会效用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两种效用的统一。所谓社会效用标准,就是要用科学的、合理的、真善美的标准来进行生产和消费,它构成了效用规律的基本内容。例如,肥肉可以食用,这是它的客观效用,而有人特别喜欢或不喜欢肥肉,这是主观效用。通常地,人们往往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是否食用肥肉。但从医学的角度看,应该按照营养学的标准选择。在这里,营养学的标准就是社会效用标准。如果某甲特别喜欢吃肥肉,这实际上是以个人喜好标准进行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会影响其健康。显

然,为了健康,甲必须克制个人偏好,按营养学标准控制肥肉的摄入。这里,甲会少吃或不吃肥肉,这就是按效用规律办事。在我看来,效用规律与价值规律一起构成了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对最为深刻的基本规律。其中,价值规律是中心性的基本规律,效用规律是根本性的基本规律。

六、什么是生产关系的本质

众所周知,传统教材对生产关系本质的概括往往归结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我以为这种概括并不全面。在我看来,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本质的观点应概括为生产要素所有制。生产要素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只有将这两个要素的所有权状况弄清楚,才能全面地考察生产关系。应该指出,传统教材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论述,实际上也论述了劳动力这个要素的所有权状态。比如谈到奴隶社会,一般都说在这个社会,生产资料归奴隶主所有,同时奴隶也归属奴隶主,这实质上就是生产要素奴隶主所有制,是生产要素完全私有制状态。

在生产要素所有制中,劳动者所有制是一级本质;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二级本质。一旦用生产要素所

有制的观点来考察生产关系的发展,那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以及进步性将会得到更加符合逻辑的论证。如果再联系生产力的五大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式的三大发展时期,就更容易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状态的多角度概括和划分。比如,除了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替代的划分外,还有三次文明的依次演进的划分,还有两大历史时期的区别,等等。

由上述六大切入点出发,我们有可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运用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以超然其上、包容改造、去伪存真和敢弃敢扬的气度看待其他经济学理论,并有可能据此使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化。

注释:

①宋健,惠永正.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干部选读)[M].北京:科学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6.

②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280.

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刘海燕

摘要:

随着信息和运输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地球成了“小村庄”。随着贸易日益拓展,东方的儒文化与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开始发生碰撞,根植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西方现代企业管理也日渐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入影响。

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腾飞,使东方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备受关注。儒家的管理思想,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中的有识之士研究并应用,儒家民本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影响也越来越深。那么,长存于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儒家学说到底哪些内容能够为现代中国企业管理所用呢?首先,我们需从儒家思想的特点及民本思想内涵入手去认识它。

一、儒家思想的特点及民本思想内涵

(一)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紧密结合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始创,孟子形成系统的理论,

至二程、朱熹发展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包含政治、教育、人性、人生、家庭等内容,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认知、求知、修养等方法论。

(二)以人为本、君权至上的价值取向

孔子轻天道,重人道。人是孔子儒学的出发点,也是《论语》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归宿。孔子形成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主张对人欲给予正确引导,努力开发民智,挖掘人力的人道主义精神。

(三)“天人合一”的统摄方法

儒家把传统文化的思维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把“天道、地道、人道”即自然、社会、人生作为一个表体化的系统来认知。“天人合一”的统摄方法,以人为中心来考虑自然,以个人经验的合理类推去认知世界。